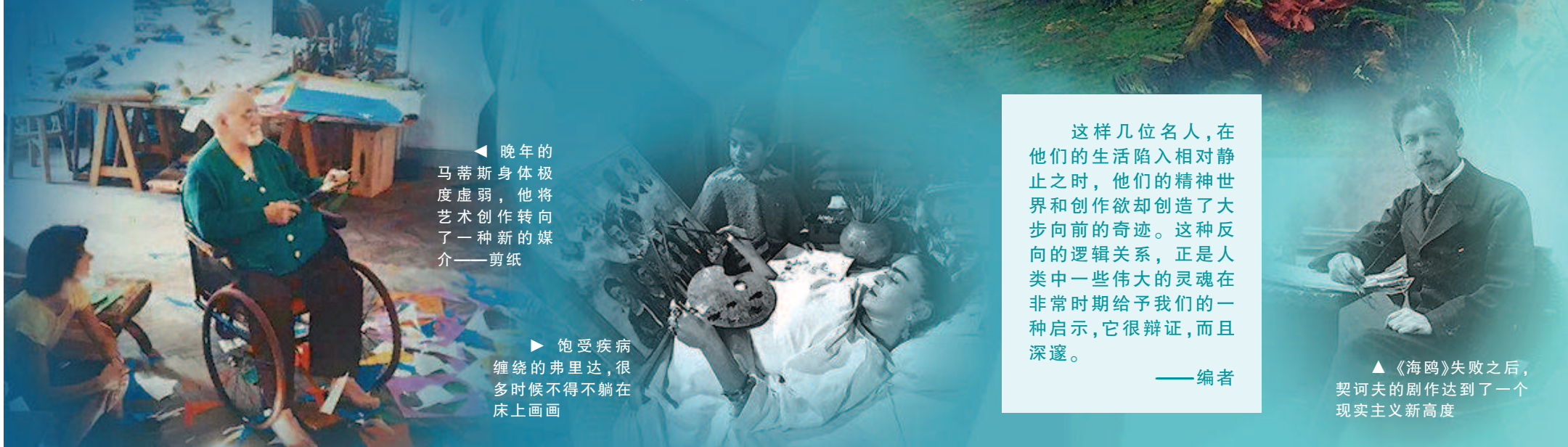


人生陷入困顿 创造力却大步向前

陈熙涵



在伦敦大瘟疫爆发的困顿时期，少年牛顿构思出了力学三大定律

晚年的马蒂斯身体极度虚弱，他将艺术创作转向了一种新的媒介——剪纸

饱受疾病缠扰的弗里达，很多时候不得不躺在床上画画

这样几位名人，在他们的生活陷入相对静止之时，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创作欲却创造了大步向前的奇迹。这种反向的逻辑关系，正是人类中一些伟大的灵魂在非正常时期给予我们的一种启示，它很辩证，而且深邃。

——编者

《海鸥》失败之后，契诃夫的剧作达到了一个现实主义新高度

牛顿：瘟疫期间构思出力学三大定律，“家里蹲”的科研成果你知道吗？

1665年，一场瘟疫席卷全英国。在当时的科学认知水平和医疗条件下，仅仅两个月的时间，瘟疫就夺去了伦敦五万人的生命。一时间人心惶惶，很多人回到乡村躲避。剑桥大学为了预防瘟疫而关闭，牛顿只好中断学业，回到家乡沃尔索普进行自我隔离，不串门、不逛街、不参加聚会。就在这段独处的清静岁月，1666年后

来成为历史上的物理学奇迹年。恰好在这段困顿的时期，牛顿构思出了力学三大定律，万有引力、微积分和色彩理论，一举奠定了经典力学的基础。著名的苹果砸到牛顿头上的故事，就是在这段时间发生的。牛顿的科学成就固然是相当伟大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牛顿提出了一套科学辩证思考方式和理性的世界观。从此之后一直到爱因斯坦时代，这两百多

年里全世界的科学、政治、文化几乎都是在牛顿建立的世界体系里运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社会的起源，就是牛顿所建立的。我们在感到惊奇的同时，也应该问问自己，闷在家里的自我隔离期到底如何才会有意义。牛顿和那场300多年前的伦敦大瘟疫告诉每位年轻人：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也许就是在悠长假期拉开的。

普希金：“波尔金诺之秋”在他文学生涯中具里程碑意义

1830年9月初，普希金离开莫斯科前往波尔金诺处理叔父的后事。那时候，波尔金诺已经流行起了霍乱，这是与鼠疫一样凶险的病毒，从欧洲一路蔓延开来。很多人开始纷纷逃离。有人劝他尽快返回莫斯科，然而，虽然波尔金诺是个贫穷的村庄，但普希金却在那里感到了心情的松弛和愉快，他迟迟没有动身。

后人看来，这种被迫的隔离就像是普希金求之不得的。在此他不仅获得了一个机会，冷静地反思这场即将迎来的婚姻，更重要的是给他久违了的创作以心境和时间。在此期间，普希金诗歌的内在灵魂得以回归。他在给朋友普列特涅夫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我周围是不治之症，霍乱流行……它随时都可能把我们全部吃掉……但你可能无法想象，我在这里写诗是何等快活……这个小村庄多么美妙呀！……”

包括《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两章。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之后，普希金又陆续创作出四部悲剧、若干短篇小说和几十首诗歌，几乎篇篇佳作。此时此刻，被霍乱包围的波尔金诺，成为了普希金生命的避风港，他不仅实现了文学风格的蜕变，也铸就了他一生创作的核心价值，形成诗一般灿烂的“波尔金诺之秋”，在他不长的文学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而这一切不可思议地是在疫情中完成的。

契诃夫：《海鸥》失败之后，他的剧作达到了一个现实主义新高度

1896年10月，俄罗斯剧作家契诃夫的《海鸥》在圣彼得堡首次公演。观众显得十分迷茫，他们对这部剧爱不起来……剧中复杂的爱情关系和曲折的情节，被契诃夫庸常的生活——聚餐、打牌、聊天——“织”成一部散文、情节统一和人物统一浑然无存的剧作。契诃夫可谓倾尽了所有的心力。他在当时居住的梅里霍沃庄园开辟了一间专门用于写作的房间，至今

该房间的门前还挂着一块牌子：“我的房子，我住在这里写《海鸥》”。众所周知，契诃夫与人缘好，平时爱与人交谈。但在写作《海鸥》时，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并在屋上升起一面旗帜，而写作的间隙这面旗帜才会降下来，朋友们看到旗帜降下来了才会找他聊天。这样倾尽全力的作品失败了，契诃夫心中的难受可想而知。他的人生似乎被这次失败的首演所击垮。失望之余，他赌咒发誓：“除非活到七百岁，否则我再也不写戏了……”

而是潜心创作出了一生中最著名的几部戏剧：《万尼亚舅舅》《三姐妹》《樱桃园》……一度达到了现实主义的新高度。他最终像《海鸥》中的妮娜一样，用一种充沛的热情，拥抱了自己所爱的艺术。值得庆幸的是，《海鸥》演出失败的两年后，便遇到了伟大的剧场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科，该剧终于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后来更是成为斯坦尼体系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时至今日，《海鸥》仍在世界各地被不断地搬演。

史铁生：人生得失皆有，苦乐相叠，苦难为内心铸就字字铿锵的信念

许多人读过中学课文《我与地坛》，看到那个饱受命运折磨，抱怨世界不公，甚至对母亲大发脾气的少年史铁生。可大家也许不曾看到那个被命运扼喉在轮椅上，精神却傲然挺立的史铁生。

带着尿壶，不能远行，他不想给家人添麻烦，大部分时间就独自一人去附近的地坛呆着，去那里看书或写作，一呆就是大半天。他有一万种理由选择死，但他选择了活着，并持续写作。在苦海泛舟的岁月里，史铁生创作了20部短篇小说、六部中篇小说、两部长篇小说、18部随笔散文、两部电影剧本。直到现在，很多人还在说：到北京可以不去长城，不去十三陵，但一定要去看一看地坛。

好在他在契诃夫的赌咒发誓，很快就被他遗忘了。在《海鸥》遭遇恶评之后的几年，契诃夫困守于失败所带来的挫败感中，却没有任由自我怀疑主宰他的人生，

史铁生：人生得失皆有，苦乐相叠，苦难为内心铸就字字铿锵的信念

倘若你读史铁生，读一读《病隙碎笔》。1951年1月4日，史铁生出生在北京，中学在清华附中就读，是学校里的顶尖学生，体育特别好，尤其擅长80米跨栏。他用外八字脚跑步，上身冲摆式打晃，跑起来像刚出斗兽场的野牛，只要有他参加的比赛，一冲就是第一名。20岁那年，史铁生在山里放牛，遭遇暴雨和冰雹，无处可躲。沟沟壑壑的黄土高原上，只剩下暴雨中的史铁生和一头老牛。雨停了，回到家，史铁生发了高烧，大病一场。

尤甚值得一提的是《病隙碎笔》，是史铁生在肾衰竭到尿毒症并需要透析的那段时间，用三年时间，在病床上慢慢写完的一本书，给了多少同样身处迷茫艰难甚至绝望当中的人以启示。它告诉人们，病痛与残疾，不会阻碍一个健全而丰富的灵魂。生活中的苦难和某种意义上的困守，会为勇者的内心铸就字字铿锵的信念。

《病隙碎笔》中记录下周梅英病重时高烧不断，水米难进，瘦得只剩一副骨架，腹部还在不断溃烂的状态，但他不呻吟，这样在病床一躺三年，从黑夜到白昼。史铁生钦佩他的好友。他这样写道：“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这是实情，孤苦无助，病痛缠身不算什么，每一分每一秒都要笃定地接受命运和善待自己的思想。”

他以为自己的身体强壮，扛一扛就过去了。一年后，他的下肢彻底瘫痪，从80米跨栏冠军变成了一个轮椅上的人。1980年末，瘫痪的史铁生又得了肾病，连正常排尿都是问题，从此一生只能插着尿管，随身带着尿壶。

一次在接受采访时，史铁生笑说自己的职业是生病，顺便写东西。48年一半时间用于生病，各种病成群结队相中了他，想必是因为他承受得起。史铁生有一位非常珍贵的友人周梅英。他在《病隙

碎笔》中还写道，生病也是人生体验，甚至是别开生面的游历。人生得失皆有，苦乐相叠，你不能从中单单拿掉苦难。《病隙碎笔》中的243则充满智慧与安详的随笔文字，是病中的作者以生命的追问方式来不断捕捉思想的火花而逐一写成的。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史铁生在书中所说的一句话：“生命本无意义，是‘我’使（自己的）生命获得了意义。”

这是作家史铁生面对生命的问卷，给自己的答案。

生命里路过的那些苦痛，他们用艺术来对抗

月白釉

无论对于弗里达还是米开朗基罗，绘画都是他们挑战命运以及自我实现的方式

“痛苦没有尽头，它有具体的形式。有时，它是物质方面的凌虐，比如灾难、疾病、命运多舛、人类的恶意。有时，它藏在人的内心。”法国著名文豪罗曼·罗兰在《名人传》中说。前一种痛苦，墨西哥传奇女画家弗里达·卡罗可谓尝尽了。死亡的阴影，几乎笼罩了她的一生——六岁时患上小儿麻疹，致使右腿萎缩；18岁遭遇严重车祸，脊柱、骨盆、膝盖等身体多个部位断裂，腹部和子宫更是被一根铁栏杆刺穿；至少经历过32次外科手术，大多数在脊椎和右腿上……

车祸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弗里达不得不躺在床上。无意间，她开始以涂涂画画作为消遣。最终，绘画重塑了她的人生。日后弗里达在写给画商好友朱利安·利维的一封信里，提到了自己与绘画的结缘，称当时由于出了车祸，她被石膏胸衣禁锢在床上，非常烦闷，所以决定做点什么。靠着从父亲那里偷拿的一些油画颜料和母亲为她定做的特殊的画架——因为她坐不起来，“我就这样开始了绘画。”

久病对弗里达形成的禁锢，使她的绘画世界是那样独特。她画得最多的，就是自己，她坦言这是因为“我常常独在”“我就是自己最熟悉的最好的主题”。弗里达将自己看成了一个私人的世界，将其投射在画布上。其间能够让他人感受到累累病痛给她带来的变化，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状态上的。例如，她笔下自己的身体常常是裸露且带伤的，甚至有时把身体里外翻了个个儿，心脏被置于胸前，并如X光那样显示自己断裂的脊柱。即便她画水果或花卉，其意象往往也经过她自己的形象来加以过滤。她也画了自己的很多想象与梦境，“正如那场车祸改变了我的道路，许多事情阻碍我去实现一般人所认为是正常的愿望，而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画出那些难以实现的愿望更正常了。”

弗里达凭借自画像所展露的才华，让毕加索都自叹不如。痛苦与力量都渗透在她的绘画中，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让观者面对她的画时很难不有所动容。绘画，成了弗里达抗争命运也是自我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样是一生为痛苦所困，一生以艺术来对抗痛苦，“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米开朗基罗的痛苦，属于罗曼·罗兰所言的后一种。

米开朗基罗出生于佛罗伦萨的一个中产者家庭，他的一生也堪称富有。他却从未舍不得享受，过着僧侣般的贫苦生活，结石、痛风等各种疾病缠上了他，傲慢的脾气、猜忌的性格也让他缺乏人缘。最让他感到痛苦的，其实来自灵魂。

1508年，为西斯廷教堂画天顶及墙壁的壁画，米开朗基罗开始了生命中最暗淡也最崇高的岁月。这是体量巨大、难度非凡的工程。整整四年，他把自己锁在教堂里，不知疲倦地几乎是

独立进行着这项工程，还要应对来自家庭成员的索取、盘剥。在此期间，他曾给二弟弟写信道：“我在这儿生活得很苦闷，身体极度劳累。我什么朋友都没有，而我也没有朋友……我很少有时间自由自在地吃顿饭，别再让我烦心了，因为哪怕再多一丁点儿的烦恼，我都受不了。”

此后，罗马绵延的战祸、横行的瘟疫，加上疾病的侵袭，让米开朗基罗始终陷入痛苦，他却一直忘我地工作着。他将奋斗当成了一种精神需要，把一切虚火在乱发泄在工作中。米开朗基罗最终活了89岁，也将自己活成艺术史上“最接近神的人”。

百年前，一场流感曾席卷全球，蒙克和蒙德里安却因此迎来创作灵感的迸发

困局、险途、逆境，谁能终其一生有幸避免？而那些堪称伟大的艺术家，往往格外能够抓住面对挑战时的机遇，让人生从绝境中开出花来。

1918年至1920年间，“西班牙流感”席卷全球，甚至波及偏远的太平洋岛屿和寒冷的北极地区，总共感染了全世界大约5亿人，占地球人口的三分之一，造成大约2000万至5000万人死亡。两位艺术大师——爱德华·蒙克和皮特·蒙德里安，却因此次流感，迎来了创作灵感的迸发。

对于蒙克是否“中招”过此次流感，学界众说纷纭，他却通过一系列自画像和素描作品，确凿地将这场流感带给人们的恐惧传递出来，甚至能让观者从中看到无声的尖叫。名为《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画像》的油画，蒙克至少画了三幅。它们是少数根据这一流行病创作的艺术作品，也是蒙克艺术生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少时目睹多位亲人因病离世，自己也一直体弱多病，这使得疾病和死亡给了蒙克尤为深刻的感触，也成为贯穿蒙克一生的创作主题。在其中一幅《西班牙流感后的自画像》中，画面中间坐在椅子上的人，罩在过于宽大的展袍之下，显得

格外瘦削、憔悴、怪异，橙红的色调让人不免联想到他或许正在发烧。而在蒙克的另一幅同名油画中，他则画了虚弱的恢复者双膝塌陷，画面左上方的白色窗户，似乎表明光线从外面照了进来，隐隐给了人们些许希望。作品尽管同名，但构图、着色均完全不同，由此可见艺术家面对流感题材的思考绝非浮于表面。

据说蒙德里安曾感染此次流感，病症持续了数月。而在养病的这段时间里，蒙德里安反而格外安心地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进行创作。日后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件中写道：“当我染上流感时，我注意到一个人可以多么极不情愿地变得全神贯注，而且随之而来将有更好的艺术品质出现。”

养病的这段时期的蒙德里安的绘画产生了帮助。蒙德里安艺术风格上最为关键的转变，自1919年开始，他使用直线、直角、三原色等更基本的元素创作组成了独具辨识度的抽象画面。日后蒙德里安最广为人知的“格子画”正来自于此。

即便在人生暮年，遭遇突如其来的病痛疾苦，仍有艺术家能够从容应对，甚至“衰年变法”，从中可以见出的，是他们对于命运的不惧。

72岁的“野兽派”绘画创始人马蒂斯在经历过肠癌手术之后，身体虚弱得难以站在画布前挥笔作画了。躺在床上或者坐在轮椅上，他将艺术创作转向了一种新的媒介——剪纸。为了剪出花花绿绿、色彩艳丽的作品，他亲自动手染出需要的彩纸，拿着剪刀、别针、图钉变着纸上魔术，创造出充满幻想情调的动植物、人物、图形。停下来时，他会久久凝视贴在墙上的剪纸组合，让助手一遍又一遍按照他的心意组合粘贴。在马蒂斯位于南法的工作室里，他的剪纸作品几乎贴满了房间墙壁，从大小道中渐渐发展到墙壁和房间般大小。

“我现在虽然不能站起来走动，但我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进去散步的花园，一切都在这里，水果、花朵、树叶，还有飞翔的小鸟……”在人生的最后十多年，马蒂斯的精神状态非但不似一个饱经磨难的老人，反而像是返老还童，有着孩子般挥霍不完的创作热情。剪纸给病中的马蒂斯带来了快乐，也成为他艺术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章，使得马蒂斯晚年的作品炙热而富有生机，创造了“大装饰艺术”的概念。

晚年栖居在吉维尼花园的印象派艺术大师莫奈，患上了严重的眼疾。他的视网膜严重病变，以致无法分辨色调，绘画时只能凭颜料锡管上所标的字母来辨别颜色，凭记忆对事物作画，且提笔时不得不把眼睛凑得很近。对于这样一种痛苦，他曾在给友人的信里提及：“我画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困难得多，我希望我能做好，如果有双好眼睛的话，我还能画到100岁。”可莫奈仍在画，画一幅比一幅大的《睡莲》，画那些水上花园的旖旎风景。

这一时期莫奈的绘画风格的确较从前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画面更为模糊朦胧、色彩浓重，他却也仿佛挣脱了色彩的束缚，更加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作画。有艺术评论家称，此时正常人对睡莲形象的固有感知已无法禁锢莫奈，他用画笔绘出了内心视界睡莲的色彩，那是精神的颜色，真实属于他的个人意识。

莫奈晚年患上严重眼疾时画下的睡莲